

胡族习俗 与隋唐风韵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八五”项目



书目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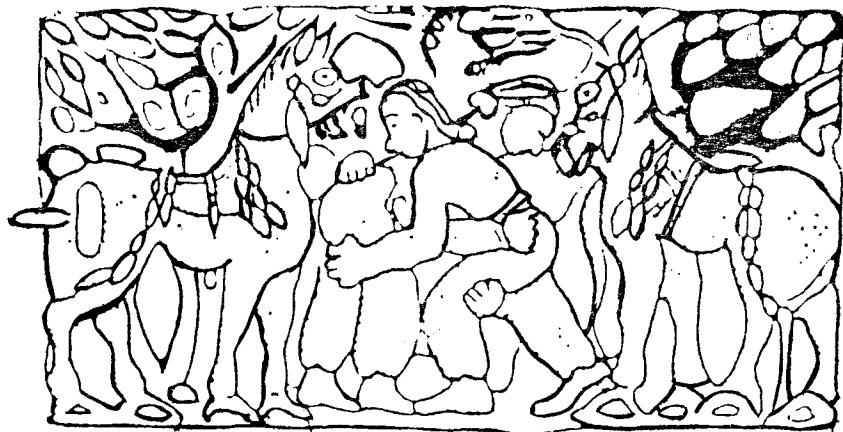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

吕一飞 著



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

吕一飞 著



△ 图一 陕西长安县客省庄匈奴墓(客省庄140号墓)出土透雕铜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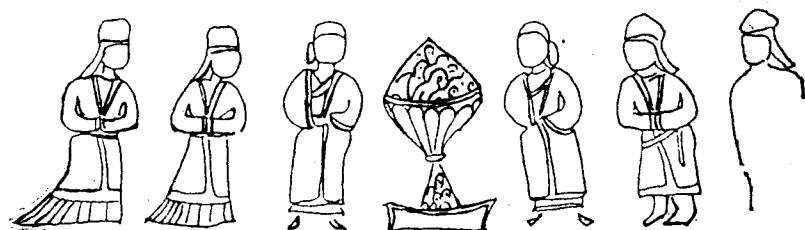


△ 图三 甘肃酒泉丁家湾五号墓壁画《运输图》

▷ 图二 敦煌石窟二八五窟(西魏)供养人像



△ 图五之一 大同云冈石窟第一七窟南壁东龕男供养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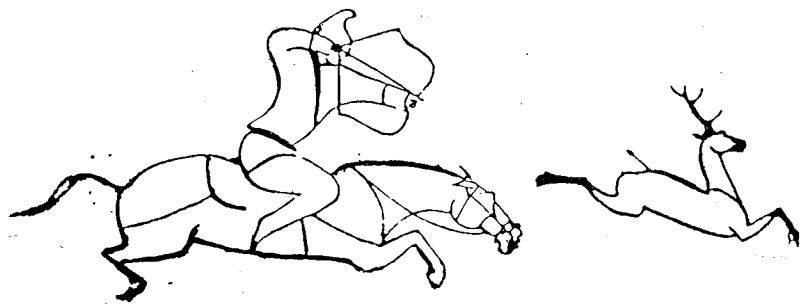
△ 图五之二 大同云冈石窟第一六窟南壁门拱东侧弥勒龕下供养人像



△图四 甘肃酒泉丁家闸
五号墓壁画《农耕图》

▽图六 戴浑脱帽、持刀盾的北方民族骑士像
(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石刻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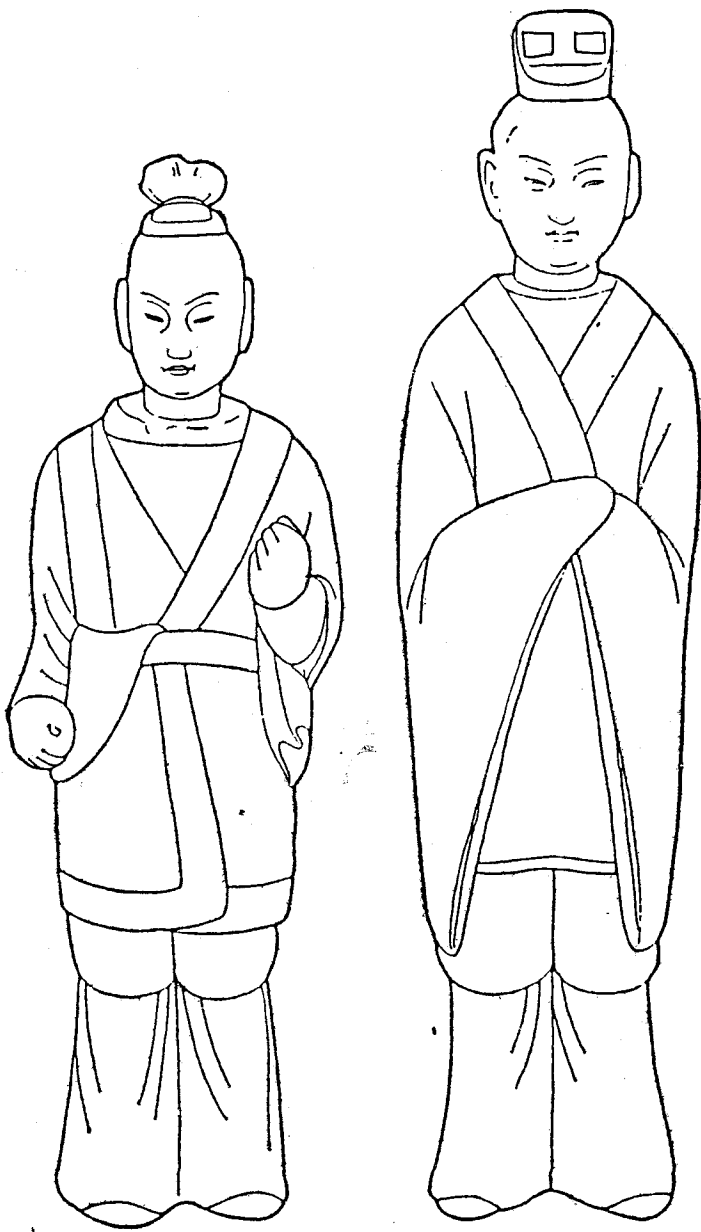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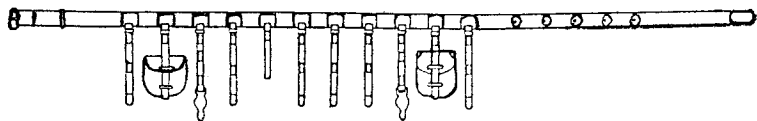
△ 图七 戴浑脱帽、左衽骑士射鹿图(汉代空心砖)



△ 图八 敦煌石窟第二八八窟(西魏)
东壁南侧壁画供养人像



△ 图九 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北朝著袴褶陶俑



△图一〇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蹀躞带(束在附马萧绍矩腰间)

▽图一二 唐戴帷帽、骑马出行妇女俑



△ 图一 唐李贤墓壁画 狩猎出行图



▷ 图一三 穿小袖袍、佩蹀躞带侍女石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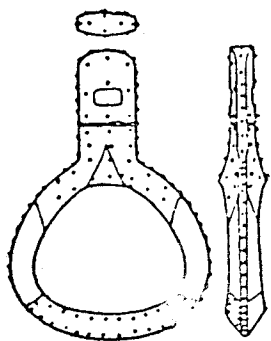
画(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图一四 戴浑脱帽、穿胡服、佩蹀躞带侍女石刻线画
(陕西西安唐韦项墓出土)

▷图一八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双铎





△图一五 敦煌石窟壁画中束蹠履七事西夏进香贵族



◁ 图一六 敦煌莫高窟420窟壁画
武士坐胡床示意图



▷ 图一七 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瓷骑俑、单铙

前言

本书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历史上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此外也包括北方草原上后起的胡族，如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以及它们对当世和隋、唐的影响。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建国以来几十年间，国内史家对社会风俗史不大重视，研究薄弱。至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史，更是少有问津。近年来，在国内史学界，社会史研究崛起，并立即成了史学研究的新热点，也成为历史学走出低谷的抉择之一。社会风俗史则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社会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其事虽小，其所相关则甚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经济水平、科学文化、精神风貌、民族性格的综合反映；故政治家可以通过“移风易俗”，兴利除弊，以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关于这一点，古人早有认识，《礼记·乐记》曰：“移风易俗，天下以宁”，《史记·李斯列传》也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而史学家则可以通过风俗民情之迁移，来考察社会的演变，人群的进化，以通古今之变；研究社会风俗史的意义，可谓大矣！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史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不仅是汉族、也是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史的研究，不仅

可以加深对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还可以了解到它们对汉族社会的影响、作用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所以，这一研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胡族）的活动非常突出，影响深远。有关他们社会风俗的文献记载，不但远比春秋战国时期丰富，而且有许多是首次被载入史籍。所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的缺憾，也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物，又为唐代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可以促进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史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

这是我之所以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王朝，生机焕发，英姿蓬勃，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盛唐气象”。这种盛大气象之所以形成，不仅是它继承了汉、魏封建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大量吸收了周边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胡族）的优秀文化，用精取宏，汇于一炉而冶之，故能别开生面，创造出空前宏伟的局面。如果我们从社会风俗史的角度来研究一下“盛唐气象”的来源和发展，考察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胡族的社会风俗对它有什么影响和作用，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几年前，我撰写了一本书《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安徽黄山书社于1992年出版）。该书内容涉及到北朝鲜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等问题，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北朝鲜卑族的社会风俗对隋唐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不可忽视！由此也萌发出一个念头：鲜卑族是如此，其他胡族又如何呢？如果能全面、系统地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对隋唐的影响，那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由于该书体例的限制，当时不可能就这个问题放开手来写，只能略有述论，点到为止。但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心。近年来，研读史书，愈发感到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

民族社会风俗对隋唐的影响是至深且钜的！略举数例如下：

例如，今人的服制是“上衣下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否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使这种服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呢？这恐怕是许多人都不是很清楚的事。其实，我国服饰的主流，秦汉以来是所谓“上衣下裙”，不仅妇女，即使男人也穿戴是如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一场大变革，秦汉以来的服饰主流“上衣下裳”，逐渐向“上衣下裤”转变。这一变革兴起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而造成这个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普遍流行。

又例如饮食吧，芝麻烧饼可以算得是今天最普遍的大众化食品了。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它并不是华夏族自古便有的食物，而是汉晋南北朝时期从胡族中传到中原来的，叫做“胡饼”，隋唐以后，大行于世，逐渐演变为今天各式各样的烧饼。

又例如秦汉时华夏族的坐式是跪坐，两膝跪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坐具是床或榻，当时还没有椅子。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胡人的“胡坐”和“胡床”的影响，人们的坐式逐渐发生了变化，由“跪坐”变为“胡坐”（即用臀部坐，双脚垂地，与今天的坐式大致相同），坐具也有了变化，“胡床”（一种轻便坐具，如今之马扎）逐渐普及开来，成为人们喜爱的坐具，到了后世，又演变成椅子，这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一场重大的变革。

又例如交通吧，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汉族社会日常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常见的是牛车），骑马之风并不普遍。北朝时期，由于胡族的影响，骑风大盛，这种风气影响到隋唐，唐代无论官民士庶，出门多骑马，甚至妇女也多有骑马者，这是北朝胡族在交通上对隋唐的影响。

例子颇多，举不胜举。总之，魏晋北朝胡族社会风俗对隋唐

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我之所以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既然决定写，便开始系统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史料，草拟提纲，酝酿腹稿。这时我才深深感到：要写好此书，是相当不容易的。

首先是正史中有关史料不多，这是一个难题。二十四史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就有十三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南史》），洋洋1420余万字，汗牛充栋，不可谓不多。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叙述政治的兴废和战争过程，古人称之为“相斫书”，关于日常社会风俗的史料很少，而且极为分散零碎，不成系统。往往花了很多功夫，把材料收集拢来，进行排比研究，你才发现，它们有不少是彼此孤立、缺乏中间联系的，很难根据这些材料把事物描叙得清楚完整，犹如雾中看花，朦朦胧胧，使人深有说不清楚之感。

其次是理论上的阐说也不容易，这又是一个难题。古代少数民族的日常风俗文化，外表奇异多姿，内中蕴含着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族人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不觉奇怪，但在外族人眼中却是非常奇怪和难以理解的，古代汉族史家已有这种感觉，更何况千年以后的今人呢！有些事物，虽然你可以把它叙述清楚，但其中所包含的民族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却很不容易道个明白。换言之，有些事物是什么，你或许说得清楚，但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个中原委却很难说得明白，此即俗语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说不清，道不明”，这就是目前从事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史研究者们常常遇到的困惑和尴尬。

例如，谈到北朝的胡服，《旧唐书·舆服志》曰：“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自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在这里，“长帽”是怎么回事呢，“合袴”是怎么回事

呢，“袄子”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朱紫玄黄”等颜色呢？这都需要叙述清楚，解释明白。如果一概不予解释说明，只是照引史料，让读者自己去领悟、揣摩，读者最终还是不明白。这不能说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所以，我在写本书时，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标准——说得清，道得明，叙述清楚，解释明白，尽可能做到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就需要在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上有新突破，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否则很难获得满意的效果。

在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上，我采取了两个办法：

第一、全面多渠道地收集文献资料，不仅在正史中收集材料，而且还要在各种类书、地理书、字书、文集和笔记小说中广搜史料，尽量做到“竭泽而渔”（至少是重要的史料不能漏网）。

第二、充分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石窟造象、敦煌壁画、墓葬实物和壁画、墓志铭等等，可供利用的材料就不少，有时还得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利用文物考古资料来考察以往社会的情况，我国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有成效的工作。《说郛三种》卷十八宋顾文荐《负暄杂录》：

辨验古之衣冠制度，多于古画中见之，不可不详加审正。汉魏晋时皆冠服，未尝有袍、笏、帽、带。自五胡乱华，夷狄杂处。至元魏时，始有袍、帽，盖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袭其服制。向者有携旧画《唐明皇潞州像》来示予者：绛袍、黑鞬（tīng，皮带）、玉带。又尝见《李贇皇像》，亦是黑鞬、金带。咸谓未尝有黑鞬而为金玉带者。殊不详考唐朝惟有黑鞬，至五代方有红鞬。是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详审焉。

总之，只要把正史与文物考古资料、各种类书、地理书、字书、文集、笔记小说结合起来研读搜寻，就能发掘出不少新史料，克服史料少这一难题。本书写成后，笔者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引